



中国人民银行淮南支行旧址(1950-1954年)

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

淮南人行的那些年那些事

周强

(上接1月10日A2版)

从储蓄岗位干起

1952年连续两件大事,一件是淮南建市,淮南矿区改为省辖淮南市;一件是安徽建省,皖北和皖南两个行政公署撤销,合并建立安徽省,省会设在合肥市。这两次行政区域的变更调整,使原来县级淮南市的人行支行也调整为省辖市支行,业务范围从矿区为主扩大到整个城乡。当时淮南就这一家银行,全称是“中国人民银行淮南支行”,既是金融管理机构,又是业务经营单位。支行设在田家庵,根据服务对象不同,为城区服务的机构设有九龙岗、大通、八公山、蔡家岗等4个办事处;为农村服务的网点设有上窑营业所和洛河、洞山、蔡家岗等农村服务组。当时整个支行系统也就一百多人,因为人手紧,吴英华被留在支行机关,机关设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股室,在他的记忆中有人事股、会计股、业务股、储蓄股和金库。

吴英华告诉我,他和小赵上班的第一天,就感受到了组织上的温暖。他说,市行行长萧斌同志是位老红军,和蔼可亲,一点没有领导的架子。萧斌特地将我俩请到办公室谈话,勉励我们要继承革命传统,多向老同志学习,同时告诉我们淮南的金融事业百废待兴,鼓励我们将培训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上,尽快成为业务骨干。

吴英华开始分配在支行储蓄股,负责记账和复核。当时办理储蓄存取款还非常原始,业务员的头顶上拉着一根铁丝,挂着铁夹子,前台业务员将存款凭证做好后,将凭证和存款通过铁夹子传送到后台,后台审核盖章收款,再将存折和相关凭证推回。吴英华讲得很生动,还伸起右手前推示意了一下。其实这不是银行的“专利”,我也见过不少,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,还经常见到邮政局、供销社、商店这些门点用这种方法传递钱币凭证,甚至有的机关办公室也在墙上钻个洞,用这种方式传送文件或安排工作。

吴英华说,刚解放时,人民群众对储蓄政策还很不了解,当时还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,工人的工资收入比较低,所以储蓄业务开展困难。他们通过储蓄宣传、政策动员,组织流动服务组,到生产企业和居委会进行服务宣传,逐步取得群众信赖,储蓄业务才打开局面。后来,上门服务的储蓄业务量甚至超过了网点门面,全市有超过一半的职工都在银行办了存折,经常到银行储蓄存款。他去做过宣传上门服务的单位就有大通矿、九龙岗矿和田家庵几个纺织合作社,还跑过码头工会,向搬运工进行宣传。

干储蓄的那几年,吴英华见识了许多种类货币,包括旧社会流通的袁大头、金圆券,解放区流通的纸币,新中国流通的旧币,叁元面值的新币。1953年,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一种叁元纸币,现在的收藏价值已经涨到5万元一张。

在市支行干了两年,支行机关搬迁到洞山火车站旁边,当时火车站站房还在铁路南边。因为建行刚建立,且归属人行,所以淮河路的人行支行旧址就留给建行了。伴随着这次机关搬迁,人员也进行了调整,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的吴英华被领导安排充实基层,去了大通办事处,地点在居仁村。

矿井常客

那时候,吴英华是矿井的常客,每年都要下去一二十次。我问他,“你在银行工作,下井这么勤是去干什么?”他说因为工作需要,其来淮南之初,因为储蓄业务量不稳定,经常会有闲暇时间,于是领导给他增加工作,就是陪客人参观矿山。省分行领导或者业务单位客人来到淮南,参观西部新矿区建设成为一门必修课。每当有接待参观考察任务,领导总要吆喝一声,“小吴,走,跟着一块。”有时候省里分行处室或兄弟支行的同志光临淮南,市支行领导实在没有时间,干脆就安排吴英华负责全程接待。因为他去的勤,加上后来又调去大通工作,于是和矿上许多同志慢慢都处成了朋友。吴友忠当时担任大通矿工人科(后来改称“劳资科”)科长,因为都姓吴,两人聊起来很投机。后来,吴友忠担任了淮南矿务局党委书记,另一位朋友王声明当时在大通矿担任采煤区支部书记,后担任两淮指挥部副指挥长。丰绪然是解放初淮南知名的全国劳模,还作为工人代表访问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。吴英华听丰绪然作过报告,后来也成为了朋友。

在支行的时候,吴英华陪客人去的矿山主要是西部新矿区的谢一矿和谢二矿。他来淮南时,谢一矿接近完工,谢二矿刚刚投入建设。因此去谢一矿就是陪客人参观新矿井,去谢二矿就是看火热的建设场面。上世纪50年代正是淮南煤炭工业由东部一隅扩展到西部大开发,取得快速发展的时期,煤炭需求量不断增加,催动西部新矿区建设突飞猛进,日新月异,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业化进程的缩影。谢一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淮南矿区建设的第一对新矿井,1949年开工建设,1952年11月投产。吴英华说,因为经常下井,他在谢一矿看到采煤方法在不断改进,回家翻翻《淮南市志》才明白,吴英华说的实际上就是倒台阶采煤法向掩护支架采煤法的改进。

在“劳动最光荣”的年代,工人们以当矿工为荣,姑娘们以嫁给矿工为荣,这是与吴英华同时代许多人的青春记忆。他说过这样一件事,1952年年底,有一次他陪省分行有关处室同志参观大通矿,在宣传橱窗前,他们看到张贴着大通矿向九龙岗矿发出的红色挑战书,挑战内容包括产量、安全、技术革新,九龙岗矿的应战书也贴在旁边。客人们饶有兴致地驻足,看了挑战书,又看应战书。他们与吴英华一样,都被工人们无私奉献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激情所感染。后来我在淮南日报社资料室,发现当年《淮矿工人报》对这件事有过报道,文章的标题是《坚决完成全年生产任务,大通矿向九龙岗矿发起挑战》。

感受“大家庭”

新中国建立初期,曾沿袭过战争年代的分配制度,对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。吴英华刚参加工作,因没有家庭负担,享受的就是这种没有工资的供给制。简单地说,就是衣食住全包,再发一点寥寥的津贴当作零花。刚

上班那个月的津贴是3万旧币,相当于后来的3元钱。到年底赶上增加津贴的政策,长到5万旧币。虽然是少了点,可对于吴英华来说,倒乐得省心,不用操心吃喝拉撒睡,不必购买油米酱醋柴。一人吃好,全家不饿,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学习当中,而且可以使他远离烟酒,这个好习惯竟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于是我追问,“在供给制状态下,你怎么住怎么吃?”

吴英华虽然已经88岁,但回忆起来还是思绪清晰,许多人的名字都还记得非常清楚。他说刚到淮南时,开始住的是集体宿舍,位置在银行后边的家属院里,两人一间,跟他同宿舍的是吴启忠,后来担任淮南工行办公室主任。调大通办事处后,与他同宿舍的是袁励进,后来担任中国银行淮南支行副行长。吴英华在大通又干了约一年,才分到自己的单间,也就10来平方,公家的标配是一张床,一个三抽书桌,一个脸盆架再配一个脸盆。夏季,自己解决乘凉问题,寒冬腊月,单位还给分配一捆铺床稻草。

吃的就在食堂。银行的同志心思都很简单,大家都想着建设社会主义,吴英华他们把干好工作当作建设社会主义,搞行政的同志和食堂厨师把让他们吃好不想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,大家都想到一块,那时候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简单,真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。

穿的也是这样,单位配给,冬有棉夏有单,虽然色泽单调,但大家都是这样,也没有人讲究。女同志却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当时流行苏联老大哥的“布拉吉”,也就是连衣裙,比男同志穿得漂亮。我可以想象出来,在那色彩单调的年代,姑娘们穿着漂亮的连衣裙,风姿绰约,青春靓丽,给火红的年代又点缀了多少动感之美。

他们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。刚参加工作那会,就像是部队里的人伍新兵,单位对他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,早晨5点半就得起床,然后跑步、出操,讲讲前一天的国内外大事。7点钟休息和早餐。上班一天,吃过晚饭,晚上7点到9点又是政治学习。只有周六和周日的晚上不学习,周日的早上不出操。直到结束单身,早晚的业余时间才归属自己。

说到这让我有了同感,我刚刚入社会时的经历与他极为相似,先是下放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云台农场,后来转到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的潘村农场,两个农场都实行半军事化管理。虽然发点工资,吃食堂要掏饭票,穿衣服是自己买,其他都与供给制完全相似。早晨的军训和晚上的学习,如出一辙。

到1955年,吴英华享受三年多的供给制后,机关全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,吴英华定为行政24级,月薪47元。这一说让我羡慕不已,当时我的家庭在苏北地区属于中等,大哥已经成家分居,家里还有父母,一个姐姐一个哥哥,我还在读书,一家5口人,就靠父亲一个月40多元的工资。我这一羡慕,吴英华就更受用了,然后又继续娓娓道来,继续讲述他的单身年代之幸福,让我分享并羡慕着。

(未完待续)